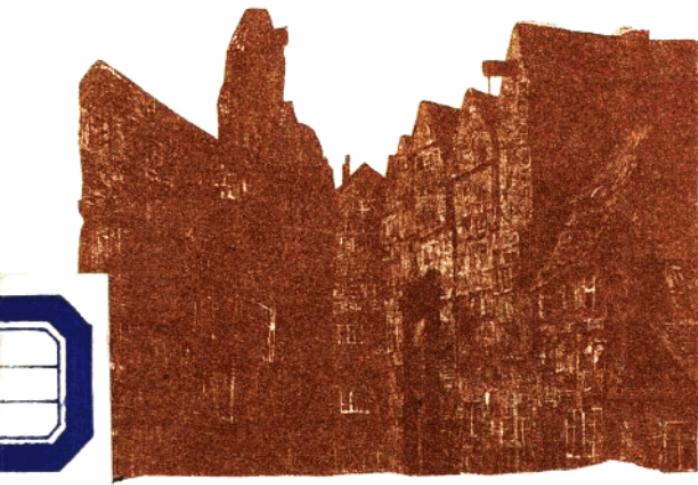


社會主義叢書
004

歐洲思潮引介

第一卷



社會主義叢書004

歐洲思潮引介 第一卷

稻鄉出版社

歐洲思潮引介 第一卷

編譯者	張君勤	勁學	會哲
責任編輯	潘光		強
發行人	彭永		
出版者	稻鄉	出 版	社
地 址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53巷35號		
電 話	(02)9626844		
郵撥帳號	1204048-1		
印 刷	聯和印製有限公司		
初 版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二月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4149號		
定 價	一一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082002

破損本，缺頁本請寄回本社更換

編者前言

西力東漸，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互動關係，始終是中國近代史脈絡中的重要問題。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前輩先賢投注心力均夥，然惜仍未能日起有功，雖議論紛紛，「如五四之科玄論爭，如……台灣之中西論戰，甲說東方精神文明，乙說西方物質文明，甲說人生意志自由，乙說萬物萬事皆有定律。此皆空泛議論，無補於科學之發展者也」。此實未知「每種學問之內容如何，方法如何」，亦不知「一種理論、一種體系達成之不易」而遂因意見不同，不知立言分寸，乃至以謾罵為事¹。能平心綜覽中西文化，攷其異，求其同者，十無一二。

雖然我們都知道，「吾人處此文化交流時代，應會合東西，鎔鑄於一爐之中，知自己之所長所短之後，就其長者而守之，就其短者而去之」並能「知西方之所長所短，不論其為近代古代為玄學為科學，一律平等視之，悉心研究之後，再定去取。此乃今後廓大自己見聞、智識以求文化復興之惟一方法也」²。但是我們觀察到，自身所處之環境所表現出來的，正好是同這一個理念相反的。這兒自然不是檢討這一個窘局的適當機會，然則我們都願意在實踐中向這一理念前進希望能由此突破這麼樣的一個難關。這也正是繼承了張君勣先生的會通中西文化這一理想，由一羣青年學術工作者所組成的張君勣學會，毅然推出本書之緣由。

中西文化各有其歷史淵源，脈絡不一，表徵亦異，張君勣

先生論此之著夥矣，於此不能詳論³，唯其核心實在於「悉心研究，再定去取」。只有這樣，我們對於自身文化，對西方文化之認識，方是真切的，全面的，論同求異始有共通之基礎。否則「不顧竭人之所有而盡學之，好自標高立異，本一己之好惡，作學說之迎拒」⁴，不過是另一種文化買辦罷了。本於此，我們希望在造成「學問之獨立王國」的努力中，以「盡其在我」之心，奉獻一愚之得，起同聲同氣之響應，成大公無我之合作⁵，而免以學術為私器，為秘藏之弊，益發敗壞當前之學風。是以，我們不辭淺陋，以團隊合作的方式，推出這卷《歐洲思潮引介》，斯亦此意而已。

張君勸先生嘗嘆，「西方人早已譯吾國之五經四書，與管、商、荀、韓之書，何以吾國對於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兒、康德、黑格爾、陸克、休謨、羅素之作，不能盡取而譯之。此非知彼之道，有所未盡乎？」⁶ 我們深知譯事之重要性，於先生之嘆更心有戚戚焉。但限於學識，於先生之所望，實難成其大較；故本卷諸文，雖以彌補先生之憾為本，然不敢謂達此目標。倘能助此間學界一二者，實為吾等之幸。並祈博雅君子，不吝指正。

本卷成書，首應向出版者稻鄉出版社發行人彭永強先生，總編輯李明仁先生，編輯游奇惠小姐致無上之謝意；孫善豪、傅尚裕、陸先恒、楊植勝諸先生，費力遂譯；執編者潘光哲先生校讀全書，譯述參考書目，所費心力尤多，本學會於此同致謝意。

張君勸學會

一九八八.九.

註 釋：

- 1.張君勳，〈中國專制君主政制之評議〉（台北，弘文館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二月初版），頁 106-7。
- 2.張君勳，〈老當益壯之自白〉，收入：氏著，程文熙編，《中西印哲學文集》，上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初版），頁 161。
- 3.可參看註二引書，所收張氏諸文。
- 4.同註二，頁 158。
- 5.張君勳，〈文化核心問題——學問之獨立王國論〉，收入：註二引書。
- 6.張君勳，〈明日之中國文化再版新序〉，收入註二引書，下冊，頁 1401。在〈中國文化對於西方挑戰之反應〉一文中，張氏亦有同樣之觀點，本文並收入同書，上冊，頁 233-5。

編　　例

一、本卷所收諸文，是以近年來甚受矚目的七位思想人物：
H. Gadamer, M. Foucault, T. Kuhn, J. Rawls, J. Habermas, L. Althusser, F. Braudel 為討論對象。他們代表了當前西方思潮的最高水平，在各個領域內不斷地激發我們的思考。於今一併呈顯國人面前，希望對關注當前西方思想發展的朋友有些微的助益。

二、本卷所收諸文，除〈視野的融合〉、〈解讀孚構的思想〉二文外，原係英國廣播公司（BBC）第三頻道播出的演講稿，後刊於：*The Listener* (London 出版) 這分雜誌的第 111 卷，總號 2852 到 2859 各期 (1984, 4.5 ~ 5.2)。

三、各篇講稿，後經各講員略加改寫，增加徵引書註後收入下書：

Quentin Skinner, ed.: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經核校後發現，收入上書的各篇文稿，論旨大體不變；而對 T. Kuhn 有更為精詳的論述，為使 讀者能對 T. Kuhn 有更正確的理解，因此本書第六篇：〈論湯馬士·孔恩〉遂依上書所收之正文譯出，其餘各篇則依刊於 *The Listener* 上的講稿譯出，不再註明出處。

四、為使 讀者對 H. Gadamer 及 M. Foucault 有另一面相的認識，經徵求《宇宙》雜誌同意，將原刊於該刊 16 卷 2 期(

VI 歐洲思潮引介

1986. 2) 及 16 卷 5 期 (1986. 5) 的兩篇文稿：〈視野的融合〉、〈解讀孚構的思想〉蒐羅進來，希望亦能助於 讀者對這兩位思想大師的理解。

五、各篇講稿集結成書後，除第一篇導論（即本書第一篇：巨型理論之回歸）一文外，均附 *Further Reading*。將做為進一步研究指引用的各書書目統附編於書末；本書則譯之為「閱讀書目」一欄，將所引各書書目直接附於文內，以省翻檢之勞，並將台灣地區有繙印本的各書，於書名末右上角附 * 號，以便 讀者。

封面設計
楊植勝

目 錄

編者前言

編 例

/	巨型理論之回歸 / 孫善豪譯
13	論嘉達瑪 / 傅尚裕譯
27	視野的融合 / 傅尚裕譯
41	論米榭·孚構 / 傅尚裕譯
55	解讀孚構的思想 / 傅尚裕譯
69	論湯馬士·孔恩 / 楊植勝譯
83	約翰·羅斯 / 孫善豪譯
97	論哈伯瑪斯 / 孫善豪譯
109	論路易·阿圖舍 / 傅尚裕譯
127	論布賀岱 / 陸先恒譯
	譯者簡介

巨型理論之回歸

孫善豪 / 譯

英國思想在傳統上，對於那種由其所不喜歡的歐陸傳統所組織起來的對人與社會之概括化的思慮，就帶著敵意。但是現在看來，學術風氣也許是在改變了。在未來的數週內，《聽眾》（*The Listener*）將登載一系列的文章，概述一些包括在這個重要的發展之中的作品與思想家。下面，史金納（Quentin Skinner），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介紹了各次的配置。

廿五年前，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在其關於英語世界的人文科學狀況的著作：《社會學的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中，拒絕並申斥了他認為有礙於他所描述的「社會學的想像」之有效發展的，兩種主要理論傳統。第一個阻礙，是一種——米爾斯特別將之關聯於馬克思主義——操作歷史證據以便製造他所謂的「超歷史的緊身衣」之傾向。而另外一個對人文科學之進步造成更大阻礙的，米爾斯稱之為「巨型理論」，他所指的是相信於社會學科的基本目標應該是建構關於「『人與社會的本質』的一套系統理論」的思慮。

此一對人性與人的舉止之抽象理論之敵視，是他與當時的英語系社會學、甚至所有人文科學的領導者，所共同分享的。例如，你在歷史的研究中，會發現同樣的懷疑共鳴。有跡象顯示，在我所說的那個時代，羅維·納米爾爵士（Sir Lewis Namier）普遍地被推崇為英國史學的泰斗。我這樣說是因為納米爾不僅在他編年紀錄下政治權力核心的行動者之詳細策略時，感到最大的快樂；他同時也是一位尖酸的批評者，批評那些對任何普遍的社會理論（或是他喜歡稱呼之的，夢囈）之信仰，認為它們可能可以解釋政治行為或社會變遷過程。

你甚至會遭遇到對於同樣的概括化的道德與政治理論之同樣的懷疑主義，這個懷疑主義表現為兩個相關並且享受著廣泛支持的主張。其一為，借用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的著名標題：過去所有的「意識型態之終結」（*The End of*

Ideology)。關聯於此的則是，實證的戒令：放棄過去巨型哲學系統之研究，放棄其中不能令人滿足的混同描述與價值因素，以便達成：去建構被稱為社會行為與社會發展的「經驗理論」的這個真正科學的任務。

此一朝向政治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趨勢，反過來被一個當時流行的觀點所鼓舞，這個觀點注意於哲學與其他文化學科間的恰當關係。哲學家被認為是這樣一個人：他的基本關心是藉由分析日常用來表達意義的字詞之意義，來說明一般概念。對於此一託囑的一個說明是：去假設對於道德、社會、或政治哲學之關心，居然可以提供我們對個別的觀念或原則作理性的辯護，這根本是個錯誤。用兩本十五世紀著名的著作的話，目標不再是對道德本身之研究，取而代之的是純粹的（用黑爾〔R. M. Hare〕的書名）對道德語言的研究；不再是對政治本身之研究，而是（用魏爾登〔T. D. Weldon〕的書名）對政治字彙的研究。所以，隨著哲學家們本身的宣告：關於當今的道德或社會課題，他們沒有什麼有系統的東西可以告訴我們；是則純粹經驗科學之萌發似乎已是被保證了的。

此一發展更且被兩種同時代的英語系哲學之顯學甚或教條，所支持著。在科學哲學中，一個對於「是什麼建構了解釋」之實證的考慮，掌握了極大的勢力。去解釋事實中之不清楚的部分，被當作一個重大事件、以顯示他們的發現可以從已知的自然法則或至少一個統計法則中被演繹（因是，可以被預測）出來。這種分析之威信，不僅効力於引導社會科學去尋求作為唯一可被接受為社會現象解釋基礎之「律則」，它同時要求社會科學相信：基本上並沒有理由說，人類行動不應該用解釋自然事件的方式被解釋。結果是：「人是科學之臣屬」——這是

艾葉（A. J. Ayer）一篇論文的標題——似乎不僅成為社會學科一個可能的、更且是它們唯一能尊重的目的。

最後，所有這些學說皆從在意義與知識之經驗理論的哲學之中心之所流行中，獲取了額外的門面裝飾。一個命題要有意義，大家都同意，則它必須清楚顯示什麼會被認為是對在命題中所體現的聲言之證成（*verification*），或至少什麼會被認為是其（用波柏〔Karl Popper〕所影響深遠的新公式）否證（*Falsification*）。要是一個命題——或理論中的一組命題——無法通過此一檢驗，則這就被當作一個清楚的指標，顯示：沒有任何事實被此命題所指涉，因此，也沒有任何意義被它談論到。波柏與他的無數弟子挾著巨大的熱情與信心，揮動此一測量桿：只有點滴經驗研究被讚揚，而馬克思主義、心理分析、宗教信仰與烏托邦的社會哲學，都全部被彼此丟在歷史的垃圾桶中了。時代確是變了，我所引介的這個原則演講，其目的在描繪並說明一些二十年間在英語系社會科學界中佔了一席之地的主要轉變。

如同此後此一系列中的講稿所會指陳的，可能是最顯著的變遷，就是廣泛地反動於這樣的假設：自然科學、實證地理解，提供了社會學科實際運作的一個適當甚且恰切的模式。此一增長中的懷疑，其最清楚的反映，就是認為「人類行為之解釋與自然事件之解釋，是在邏輯上有別的工作」此一看法之再生。是以，實證主義主要的引起爭論的論點——所有成功的解釋皆必須被套入相同的演繹模式中——已被攻擊為一個基本的錯誤。從許多不同的角度看來，所謂「詮釋學」（hermeneutics）觀點的論點，已然取而代之地建立了起來。如同此一術語之所指出的建議，詮釋學的傳統原則——對《聖經》經文之確定

意義之研究——可以被用來作為研究社會行動之模式。社會行動被建議：應該在實際上像經文一樣地被研讀、像有著屬於它們的確定意義之插話一樣被研讀。這樣，這種插話的解釋乃被認為需要——甚或採用下面這樣的形式——去恢復（*recover*）與詮釋所有在行動問題中，從完成行動的動力觀點看來，所會有的意指的（*intended*）與慣常的（*coventional*）意義。

順著這些哲學上的懷疑，一系列的道德目的也在同時興起，去對抗實證主義想把社會學科納入自然科學的想像模式中的野心。在這些批判中，某些聲音最大的是心理學家。承認所有人類行為皆是準法則（*lawlike*）、因果關係——如藍因（R. D. Laing）及其同僚所力持的一一，是預設了：去問有關異常行為的問題，就一定是問：是什麼樣的機能故障促使了異常行為之發生。而他們辯稱：這是忽略了行為問題中所能採取的反抗世界的策略之可能性。而此一忽略反過來使強迫那些機制回到其所可能企圖拒絕的社會模式中，這種權力之使用，成爲正當的。

或許在思考這些問題的人當中，最有影響力的就是米榭·孚構（Michel Foucault）了。對於他，藍因及其徒從都顯然欠了一分債。過去二十多年間，孚構編纂了對下列問題的態度之歷史個案研究：例如我們社會中的發瘋、性與犯罪。他的目的在證明這樣的聲言：對這些現象的了解，已愈來愈與社會控制的技術相關聯起來了。是以，作爲一位哲學家，孚構的主要關心乃在告訴吾人：知識上的這種聲音，與實踐上的權力運作，其間的關聯。作爲一位道德家，他目的則是促使我們打破那種在科技名義下我們所向來並繼續有增無減地在自己週遭建造起來的牢籠。

這些對社會科學之特定觀念之主張，其中一部分是由於愈來愈懷疑：科學本身是否真有能力在科學的想像成為知識之理性研究之典範之前仍存留下來，而導生出來的，並且從這個懷疑中得到了許多信心。在此，影響最深遠的是被湯馬士·孔恩（Thomas Kuhn）表現於其《科學革命之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中的。

孔恩最基本的主張是：科學之所以沒有、並且不能，模倣於波柏對科學實際運作的解說，其理由在於：我們用來檢證我們理論的，向事實之接近，其實恒是被孔恩所謂我們既存的「典範」（paradigm）、或深信不疑的架構，所過濾的。將此觀點更推而至極，則沒有任何事實是獨立於我們對之的理論之外的，其結果是，沒有任何被所有理性的人所強迫接受的觀看、分類、解釋世界的方式。

雖然，到目前為止我的觀察看來似乎是跑到矛盾中去了。如果所有反實證論者有一個共同的面貌，則它就是對高拱的理論與普遍的解釋圖式表示懷疑。但是這豈不使在人文科學返回巨型理論這個系列中，給予這些反實證論者這樣崇高的地位，成為多餘的了嗎？

我的第一個回答是，即使當像爭構這樣一個偶像破壞者，在拒絕那種理論化的行動時，他自己當然仍參與於理論化之中。無疑地，如此的偶像破壞主義，如果只是暴露出被接受的信仰之不適當性，則它確造成了一個有形的影響，而重新導引了當代的社會理論家。所以，在我的觀察中去給予懷疑主義一個崇高的地位，並無真正的弔詭。他們幾乎在不知不覺中，已被證明為人文科學中所實際流行的潮流的，巨型理論家。

但是在討論了偶像破壞主義之後，我主要的回答是，我的